

许倬云 作品

历史 LISHI FENGUANGJING 分光镜

陈宁 邵东方 / 编

中华书局

歷史 分光鏡

許倬雲 作品

陳寧 邵東方 / 編

中華書局

图书在版编目(CIP)数据

历史分光镜/许倬云著;陈宁,邵东方编. —北京:中华书局,2015.8

ISBN 978-7-101-11130-9

I. 历… II. ①许…②陈…③邵… III. 中国历史-史评
IV. K207

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(2015)第 164391 号

书 名 历史分光镜

著 者 许倬云

编 者 陈 宁 邵东方

责任编辑 徐卫东

出版发行 中华书局

(北京市丰台区太平桥西里 38 号 100073)

<http://www.zhbc.com.cn>

E-mail: zhbc@zhbc.com.cn

印 刷 北京瑞古冠中印刷厂

版 次 2015 年 8 月北京第 1 版

2015 年 8 月北京第 1 次印刷

规 格 开本/880×1230 毫米 1/32

印张 12 插页 2 字数 290 千字

印 数 1-8000 册

国际书号 ISBN 978-7-101-11130-9

定 价 56.00 元



作者 1997 年摄于罗马教廷博物馆

陽寧東方二位仁揆：隨王常亭自序一篇，相作三幀。自序文
表王中館字，餘出海子生涯，亦供二位揆又參攷之用。
相作可以內二位揆選傳用。至於手迹云云。我肩腕經
五十年指掌內，出自自然，極筆困難，是以從步有書
法訓誨。筆跡存草要為，焉有手迹"字帖"？如非再此談，
則選以以子傳用，以名如何？請卓裁。

自序之中，稍述若干筆迹之一得三焉。或與手稿又相
配合。我常是讀大，自中館為著焉。一曰杜工部海
州一得中所謂江知特前步前石，拾得餘屋不序至所
丈之變化，正中以館為之改法，並當時不在將動不
動之中。觀丈，即石經常握變化之機也。乃至變化
已定，其劇烈外，則如蘇馬坡句。驚得故岸，似在前亭
搖動千堆雪。變化漸至，又不甚劇烈，外如揚萬
里。危峭前步新改法，斷馬橫石自成據；乃有一幕局面，
而正是前初以不遠。借浮論丈，不知二位以否以印？
亦供一西耳。

四月廿四日將赴台，五月一日赴港，七月初步望必披三
數日，七月下旬返美。如有一讀摘文稿件及校讀字文三
事，請與常港中文大正歷史局聯約。(Fax: 852-2613-5685)
七月初易師域若求良晤。吉玉蒙和定將新代領在。
此致 頌安 作者 建政 四月十日

作者手迹

新 序

lishifengguangjing

《历史分光镜》是邵东方与陈宁两位学棣，共同整理我的旧作，做了一番解析。该书出版至今，也已经有二十多年了。中华书局愿意再出新版；此时，我没有力气再做一次分析，而邵、陈二位也不在一处，因此，这一个新版并没有增加内容。

可是，既然是二十年前的旧著，作为本书内容，二十多年来，我也写了一些新的著作，此处我愿意将《历史分光镜》没包括的著作内容，也作一些简单的自我检讨。

《历史分光镜》处理的旧著，主要是三本英文著作，一本是 *Ancient China in Transition*，第二本是 *Han Agriculture*，第三本是 *Western Chou Civilization*。虽然，程序上前后颠倒，但是这三本书，却是可以连成一串，当作从西周至汉代的社会文化史；这三本书，虽然重点各自不同，在方法学上，却有互通之处。

我自己的专业本行是历史学，但是，因为研究古史，不能不大量地使用考古资料，也不能不相当程度地从文化史角度处理问题。这三本书，都尝试将文化、社会、经济三项变量，整理其间彼此呼应和影响的关系。其实我在台湾中研院史语所工作时，接受老师们的指导，已经走这一研究方向。只是，当时台湾获得的大陆考古资料，比较不足，以至于在台湾的著作，没有办法充分地使用大陆考古成果。后来我在匹兹堡大学工作；那时，大陆考古资料层出不穷，涌进美国，我才能够获得那些有用的资料，以配合传承的文献资料。

从1990年以后，我在美国的学习生活，一方面教学相长，学生们提的许多问题，往往影响了我对研究的思考方向；另一方面，我有机缘参加几个跨学校、跨国际的研究团队。例如，哥伦比亚大学的一个研究团队，研究整个亚洲文化，包括印度、中国、日本等处，如何与西方文化对比和彼此影响。又例如，以色列学者在埃森斯坦领导下，一群来自不同国家的社会史、文化史、思想史、宗教学各科的学者们，共同探讨从雅斯贝尔斯所谓“轴心时代”以后，各处文化的起源和发展。又例如，有一群关心人类文化与生态之间关系的学者，也有好几次聚会，讨论这一领域的课题。匹兹堡大学历史系，又有长期的传统，并不特别着重西方文化的历史，系内的同仁有三分之二是研究西方以外的文明。同事们经常举行定期和不定期的讨论会，在比较文化与文化接触这两个项目，检讨农村和劳工运动两大课题。以上这些二三十年的学习经验，让我发展了在中国以外的视野。这几十年来继续不断的学习，我大概不够资格做一个汉学家，而是选择另一方向，担起跨学科的研究。

于是，我的读者群，一方面有学术界的期刊读者和讨论会的参与者；另一方面，我更关心如何使自己跳出中国圈，再回头看中国的经验，呈现给中文的读者，尤其是各位不自囿专业的知识分子。我总是盼望，

在全球化正在进行的今天，中国人不要总是从中国的角度看问题，中国人能够开窗看看外面的世界，再回头看看自己的房间；也许如此，中国人可以真正地与其他地区的人类，有平等互惠的关系。

这几十年来，有一段时候，我对于台湾的企业管理人员，介绍传统中国的管理学说，希望他们理解，中国几千年的管理经验，可以由此归纳的一些制度，也许有助于他们发展一套与西方目前管理制度不同的管理学。

最近二十年来，我关心一般读者对中国历史和文化的理解，因为在这个领域，一些过去的名著宏编，往往偏重于政治史的叙述，假如包含思想史的成分，也仅仅触及上层学者的思想。同时，数十年来，海峡两岸都有太多意识形态的干涉，以至于读者有受困于樊笼的痛苦。我于是写了一部《万古江河》，以口语陈述一般平民的生活和民间社会与文化。该书以江河为名，比喻中国文化吸纳多方，汇集为浩荡洪流，奔向海洋，成为全球化世界中，人类共有文化的一部分。

此后，又将一次两小时讲演的内容，扩大为一本小书《我者与他者》，讨论什么是中国人？什么是别人？最近，又因为要探索“中国”两字的定义，也是以口语方式，写了一部《华夏论述》（在大陆的书名则是《说中国》）。以上三部书，其实是一系列，目的在跳出自己，再回头审视，究竟“我”是谁？究竟“中国”是什么？这一番自我审察的工作，其实正是我们居住在国外的华人，几乎天天要面对的问题。有人有意识地面对它，有人无意间受其困扰。这三部书，与其说是专业的著作，毋宁说是自我的省视。

与这三本书平行发展的，则是我尝试对西方文明，作一番粗浅的整理。其目的和上一段所说自我的省视，互为表里。因为，一般的读者，并没有机会接触西方对其文明讨论的专著。我对于西方文明的一些论述，

也大概只能循其大纲，粗略地将一些要点介绍给读者。一本《中西文明的对照》，以互相映照呈现各自特色；一本《现代文明的成坏》，则指示今日西方主流文明正在衰败的困境，也以此警惕国人，即不应随覆舟没顶，更需戒慎恐惧，不蹈覆辙。

凡此大众教育类型的作品，当然和象牙塔里专家学者讨论的种种细节，有相当大的差异。现代学术的分工，已经到了非常繁细的地步。学刊中的论文，大概往往只有数十位同行仔细阅读，而一般大众，却只能在十年、二十年后，读到专业知识逐渐普及化的一些概括。我之所以愿意在大众教育这一领域内，尽其绵力，也不过盼望稍微弥补这个断层留下的缺口。

以上各种工作，我并不盼望高等学府内的贤者，垂顾阅读。如果我能专家与一般读者之间作个桥梁，我愿意承担这一份任务。知我罪我，即使背上粗浅的骂名，也在所不辞。

新版的序，照理应由原来编者撰述，可是他们已经天各一方，分散在中国和美国，他们不容易再有一次合作的可能。中华书局要求我撰序，因此，赘述自己这几十年的著作性质，如上。

许倬云序于匹兹堡

二零一五年三月二十四日

原序

lishifengguangjing

陈宁与邵东方二位仁棣，负责辑录“学苑英华”所收我的作品集。二君辛苦，殊为感激！本书名为《历史分光镜》，是借用光学上棱镜分析光谱系列之意，表示历史学的功能是将历史解析为各种因缘线索及演变过程。蒙上海文艺出版社的错爱，将拙作介绍给中国大陆的读者，使我颇有惭愧之感。承命要撰一篇序文，讨论在专业范围内学习过程，叙述梗概，盼能有助于读者了解本书所辑录的文字。

我生而残疾，不良于行。抗战期间，不能跋涉山路，以至未能入学。自从学习认字，有一段岁月都是在家摸索。先君性喜史地，我从他的书架上取读书刊，也熏染了史地的兴趣。

抗战胜利，返故邑无锡，才第一次入学读书。无锡学风，自东林以来，即重实学，不尚文采。辅仁中学的老师，学养之深厚，不输上庠教席，于文史輿地，每在

课本以外，多所发挥。于是，在老师们诱引之下，我也向往于三顾（顾炎武、顾祖禹、顾栋高）之学。

在台湾大学时期，本科是在历史系，研究生学程是在文科研究所。其时初创研究所，台大的文学院是第一个有硕士课程的单位，并不分科系。当时台大的师资，集大陆来台学者的精英，盛极一时。老师各有专长，不在一科一系，我因此得到窥视不同专业方法学的机会。我的学士与硕士论文，都跟随李玄伯（宗侗）先生学习。玄伯师在法国留学时将文化人类学与古代史冶铸为一，对中国古代社会的图腾、婚姻、亲族及城乡，尤有独到的见解。他的观点，应当还是演化论一系。我在考古人类系的老师李济之先生、凌纯声先生与芮逸夫先生诸师并不从文化演化论入手。济之师是考古的实证论者，纯声师是十分注重环太平洋区的文化圈、文化传播论的学者，逸夫师注意文化比较研究，非常注意中国古籍及民族志中透露古代文化的遗存痕迹，大致可列入功能学派的观点。历史系中，劳贞一（榦）先生是汉史大家。贞一师教我的是从史料中梳爬，重建古代政府制度及生活。董彦堂（作宾）先生为殷商卜辞研究奠定断代标准。从彦堂师处，我只学到了年历学，却没有在古文字学方面用功。高晓梅（去寻）先生是殷墟发掘的考古学家，从晓梅师处，我稍知商周铜器的基本知识，但于金文方面，也没有用功。——诸师教诲之恩，终身不敢或忘。

在台大与中研院史语所学习的时候，我的兴趣在春秋战国历史，为此曾将《左传》的人物排列谱系。同时，我也研习三礼，想从礼经中寻索古代信仰。我的硕士论文即是设法界分作为自然力的“天”与作为宗神与生命来源的“帝”。学士论文是《仪礼·士丧礼》中所见的灵魂观念。这两篇习作，均是玄伯师指导，然而也受逸夫师的启迪及匡正，遂是演化与比较文化研究的杂糅。

1957年我在美国芝加哥大学东方研究所读博士学位，也接受外科手术矫治两足。当时的东方研究所，以近东考古学为主，中国古史主要学者是顾立雅（Herlee Creel）先生。芝大学风自由，学生的课程安排，全由学生自己的兴趣发展。芝大的埃及学、巴比伦学与亚述学，集合欧洲来美学者与美国的学者于一堂。我在这种环境下，选课以埃及学与巴比伦学课程为主，殊得埃及学教授 John Wilson 先生之启发。芝大的社会学，兼有美国本地发展的社区社群实证研究（所谓微观社会学）与源自欧洲的社会学理论（所谓宏观社会学）两个传统。由于古代文化与宏观社会学的关系密不可分，我在东方学的顾立雅与 John Wilson 二师之外，又从 Peter Blau（社会学，尤其文官制）、Bert Hoselitz（欧洲经济史）及 Mircea Eliade（宗教学）诸位教授学习。这是我初次接触韦伯（Max Weber）的理论，一生思考，受韦氏影响甚大。我的博士论文是春秋战国时期的社会变动，后来出版为《中国古代社会史论》（*Ancient China in Transition*）一书。在这次习作中，我尝试用统计方法，根据不同时代历史人物的家世与社会背景，测量各时代社会变动的方向与幅度，再从这些现象探讨政治、经济、意识形态诸变数如何配合而有其相应的社会变动——不仅社会成员在社会阶层间的升降，也顾及社会结构本身的转变。在这一论文之后，我的研究角度，经常照顾不同变数的互动相应，我不再以为历史是由哪一种特定的力量推动；每一特定时期的历史，是由一系列当时当地的变数配合，而有其特定的变化。这一观点，在大原则上，不仅是我在专业研究上的方法，也是我观察身边事物变化的工具。

由美返台，我又回到史语所工作，也兼任台大教职。在台九年，事务丛杂，再加上个人性格不愿向集权的政权低头，终于又离台来

美。那几年内，研究范围颇注意于国家与社会之间的互动关系。《西汉政权与社会势力的交互作用》等篇即是在那几年写的。这一研究专题，后来又陆续及于汉代知识分子、中古知识分子、游侠豪强及地方大族的性质诸题。我在这方面的工作，自从 60 年代，延伸至今，其中碰到美国学术界对于市民社会、公众空间等课题一度是讨论焦点。然而，市民社会的“市民”有其欧洲中古城市的特定背景，我们不能在中国史中硬套。我毋宁是用国家力与社会力分合迎拒作为着眼点，可能比较切合中国的情形。

1970 年应约来美国匹兹堡大学任教，接到西雅图华盛顿大学汉代研究系列的邀约，撰写《汉代农业》一书。该书原是由杨联陞先生签约撰写，后来杨先生退约了，华大遂找我接下合约。为了撰写该书，我自修了一些农业经济的理论。同时，匹大历史系有一个讨论农业与农民的同仁讨论会，每个月有一位同仁提出专题报告。我从这一个讨论会中，获得教益不浅。最后成稿，却又因华大该系列的出版经费问题，耽搁了将近十年，始得付梓。

《汉代农业》是结合人口压力、农耕技术、市场网络、政府与工商关系诸方面，说明中国小农经济的特色。这一小农经济，专指小农场的精耕细作的要求，必须蓄积大量劳动力。季节性的劳动有忙闲之时，农村以这些季节性的剩余劳力，投入农舍工业。农村的手工业遂接过了制造业的部分任务。农舍制造的商品，必须有销售管道换取资金，于是市场网络得以贯穿全国，下达农村。最后这一部分，也是地理学的“中地理论”。自从汉代以来，中国的经济大致未离开这一格局，迄于近代工商业出现，农村才丧失了制造业的功能。为此，《汉代农业》一书的副题是“早期中国农业经济的形成”。

《汉代农业》一书涉及商品流转的网络，嗣后，我曾撰写有关网

络的一篇短文，指出中国旧日的网络，以大道支路形式不断向四处延伸，也不断在若干地区加密。这一网络，同时是商品集散、信息流传、人材流动诸项功能的大网，政府行政的地方权力中心，设在省城县城，也正是网络所经过的若干交叉点或中继点。在这一假设下，我还可从各时代的战争攻伐路线及国家分合形态等题目，查证网络的作用。很惭愧，心存此念，已为时十余年，我还未为此写专书。

《汉代农业》以后，又接到耶鲁大学《西周文明》一书之约。这本书是友人张光直兄主编中国古代文明系列之一。由于 60 年代在台工作时期，李济之先生吩咐我襄助他老人家主编中国古代史，我自己也撰写几篇两周的篇章。光直兄将耶鲁出版系列的《西周》一书，交我撰写，也是以为我已有了几篇论文可以打底。在撰写《西周文明》的英文版时，我先写了中文版《西周史》，只是英文版中加了同事 Linduff 所撰“两周艺术”一章。中文《西周史》的增订本，又加了“日常生活”一章。在《西周史》中，我以新出考古资料为据，兼采傅孟真先生与钱宾四先生关于周人文化渊源及周人的迁徙路线，认为在岐下成为气候以前，长时期的先周，还须追溯到与夏人接近的晋西南，然后北迁，进入草原与农耕经济的转移地带，所谓沦于戎狄，终于在避狄难时，又南徙抵达岐山的周原。由于“先周”一词的用法因人而异，有人遂以为“周原”即是“先周”了，何必再往前追溯？其实，我之追溯到更远的时代，是因为周人自己的谱系并不以“周原”为起点，而且华北新石器时代的晚期，大型国家正在形成，草原与农耕转移地带又颇因气候而有生态的变化，凡此情况都会引发许多族群移动及文化分合的现象。

我在《西周史》中，讨论天命观念，借用雅斯贝尔斯（Karl Jaspers）之观念，认为这是中国文明初次有“超越性突破”。封建制度

是周人与商人及各地族群融合的机制。至少周人封建系统下的各地统治阶层由此发展了自群认同，也在礼制方面凝聚了大同小异的上层文化。从西周王朝的铜器铭文，我尝试说明西周政府逐渐趋向复杂组织的过程，我也说明封建制度本身潜在的病根，代代分封，族群疏远，封地不敷分配，贵族遂逐渐贫穷，以至出让土地，以换取器用。这一现象又是封建经济的一个转变过程。

除了上述三本专书的研究外，我一向有兴趣的研究题目是不同文化的比较。但是，我作比较研究，不是为了寻找定律，而是寻找各文化发展的特殊轨迹，也可说是找寻殊相。例如，我希望从几个重要的古代文明发展情形中，找出各自重视的价值观及各自文化中知识分子的特有身份与功能。我认为，在那些超越与终极关怀出现时，有些古代文化有了突破的进展，从而发展为文明，其中的若干专业人士逐渐化为那些特定价值观的阐释者与传授者。这一论题是由雅斯贝尔斯提出的。但是，我的注视焦点是在于以个别文化突破进入文明后，是哪几种特色决定了这些古代文明日后开展的特定方向。

从上面这一节假设，我才尝试说明韦伯命题与李约瑟（Joseph Needham）命题的意义，亦即资本主义不出现于中国；中国公元 15 世纪以前，科技水平高于欧洲，而公元 15 世纪以后被欧洲赶上。

在古代史方面，我一向希望能将考古资料与文献资料糅合，以图重建中国古代史。这些努力，在《西周史》中，比较有落实之处。至于史前历史，文献不足征，当然就以考古资料为主体了。从考古学的各种地方性文化互相影响的过程，我尝试寻找一些发展与扩张的模式：一个文化与另一个文化相接触，先是冲突，继而交流，继而融合，最后整合为一个范围更大、内容更复杂的文化。这一文化又会与邻近文化接触，以至再次进行同样的过程：接触→冲突→交流→融合→整合。如此不断的

扩大与复杂化，终于古代文化逐渐融合为几个大文化体。这些大文化体，在历史时期，成为以中原为核心的中国文化集团，最后则成为所谓的中国文化，但仍无碍于各地有其浓淡不一的地区性特色。这些意见，恰与苏秉琦先生“区系类型”理论及“古城—古国—帝国”系列颇为一致。苏先生由考古学的成果归纳而得，我则从历史现象中摸索寻找，两种途径能有如此的一致性，也可说不同模式间有一定的互证作用。

从梁任公先生为中国历史分期得来启示，我也有过一项建议：中国文化由中原的基础扩大为中国的中国，再扩大为东亚的中国，中国必须与四邻交往，然后是亚洲的中国，最后将是世界的中国，中国终须是世界多国多文化社会中的一个参与分子。这一过程，正是考古学上诸地方文化扩大融合过程的后半截，其实是同一发展的模式。

为此，我不主张中原文化扩散于四方的说法，毋宁主张，过去所谓周边文化与“中原”文化之间，既有相对的交流，周边对中原的发展也有相当的影响。我最近比较重视中国北方与南方的考古资料，即因为北方草原族群逐渐游牧化，构成对“中原”的压力，而且由北方传入的事物，例如战车，也为“中原”文化添加了重要的成分。至于南方，则是华北族群向南侵压的地区，文化的交流与融合也有其值得注意之处。

关于中国历史的分期，我不以为可以借用欧洲历史分期的模式，僵硬地按照教条，分为原始公社到社会主义五个阶段，或上古中古近代三个时期。由于其地理条件，史前发展背景，以及各地各族互相影响的情况，中国文化涵盖的地区，应当自有分期的方式，庶不致有削足适履的苦处。

我不认为历史是一成不变的周期发展。人类制造的制度即使表面上有一延续性，但是每一时代都会有一定的变化。正如人身会有疲惫，良法美意

如果长时没有调整，也一样会有不适用之时。从这一假设下手，所谓朝代的周期，其实即与制度的衰疲败坏有关。

对于历史上一些人类造作的观念，我们亦可作如是观。例如，中国的“天下国家”观念，当然与欧洲最近数百年发展的“民族国家”异科。然而，中国普世性的“天下国家”，在汉代可有较具体的意义。唐代天子已是中國皇帝与可汗的双重身份，两个圈子，一小一大，并不相同。宋代以下，中国是在东亚多国多文化体制中的一员，根本已不可能再自诩为“天下国家”；于是，中国的天朝意识是虚骄的自欺，华夷文野之辨实即发展类似民族主义的文化主义。同样的，在佛教传入中国以前，中国有一个儒家为主的普世文化体系；在佛教进入中国以后，中国文化体系即是多元了。我最近正在这一命题上多作思考，希望能做出些像样的研究结果出来。

以上是我治学经过的一些回顾。感谢陈宁与邵东方二位命我为序，借此反省。一生在书斋中度日，现在行年六十有七，已不算年轻，在此驻足踌躇，回顾已走过的路，忽然惊觉去日苦多，来日少，而未做之事，待读之书，不知其数，也只有走一步算一步了。

许倬云

一九九七年四月十日于匹兹堡